

·旧学与新知·

主持人：徐 雁

·视听间·

## 嗣响“浙东学派”的傅璇琮

徐 雁

最近接连看到浙江宁波人士编著的两部书：傅明善先生撰著的《傅璇琮学术评传》（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和徐季子先生主编的《浙东学派当代名家：傅璇琮学术评论》（宁波出版社2007年7月版），两书相加计达六十万余字，都围绕着中国古典文学界的一位当代学者写书做文章……暑中稍得闲暇，于是产生了“深阅读”一回传主的想法。

之所以说是“深阅读”，是因为两年前就曾对傅璇琮先生“浅阅读”过。

那是在2005年春，我以傅先生的《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大象出版社2004年10月版）为引子，由书及人，拉杂述说了一番自己的观感和体悟。最后形成结论：“一个能够在人生逆境中，不断保持着求知问学精神的人终将是幸福的；一个能够在平凡得甚至颇为琐屑的编辑岗位上，最终把自己修炼成为学者的人生必然是成功的……”文章收录在我的文集《苍茫书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版）中。

带着如此认识，重读傅先生的一系列学术论著，到他以笔墨构建的唐代文史天地中采风观光，发现自有新的心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收获便是，他作为当代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者，究竟是如何嗣响“浙东学派”的？

### （一）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是一个读书人的基本品质，也是难能可贵的最高境界。诚然，“士不可不弘毅”。对于傅先生的坚韧弘毅，如今因有《傅璇琮学术评传》一书在手，我们已不难明瞭其品质的锻造过程和修炼阶梯。

由宁波大学傅明善教授撰著的《傅璇琮学术评传》，分为上、下两编，即“学术人生篇”和“学术成就篇”，凡十章。本书且传且评，夹叙夹议，通过条理传主的求学和治学历程，真实地写照了其人生的成长成才轨迹。

据本书第三章《历经坎坷，劫后人生感慨多》记述，在1955年上半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临毕业之前，这位埋头苦读的宁波

学子首次遭到了时政风浪的无情冲击，莫须有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阴影，一度笼罩在仅有23岁的青年傅璇琮的头顶上，于是“原本就十分内向的他，这时就变得更加抑郁起来，假如没有少年时期练就的刚毅气质，真不知他将如何挨过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

两年后，在爱才的母校师长赏识下侥幸留校的傅璇琮，不期而遇了“反右派”的政治风暴，从而把他从教书育人的岗位，一下子挟卷到了编辑出版单位，彻底改变了其命运的常态轨迹。而在北大，他原是随浦江清先生从事宋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的。

原来1957年夏，作为青年助教的傅璇琮，因与中文系几位师友筹划“同人刊物”的事实而被划为“右派”，被贬至商务印书馆古籍编辑室从事古书整理编辑的工作。因自己的另类身份，他在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的整整十年中，原则上不能写文章投稿，即使有所撰述，也只能以谐音的方式出现，或另取笔名，其“湛之”一名即因此而起用的（1962年10月）。

但傅先生以自己的心态安慰了自己，于是随遇而安，既敬业也乐业地工作起来。他后来回忆说：“我于1958年夏进中华书局，作为一个普通的编辑，审读、加工了不少书稿。我始终觉得当编辑是一个乐事，从来不相信‘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话。编辑的劳动不单纯是支出，稿子无论合用不合用，经过阅读，付出了劳力，同时也增加了知识，长进了学问……”

不过，就那个荒诞的时代而言，如今我们在书后附录的《傅璇琮学术年表（1951年9月—2004年12月）》中，还不难看到那于无人情的烙印：从1965年9月至1973年4月，他不是在农村参加“四清”工作队，就是在“文革”的旋涡中挣扎，或者在“五七”干部学校（也就是知识分子劳动改造之所）劳农。

然而除了令人痛定思痛的生命时光流失外，我们还能看到的，是他身上那种人定以后运动宿命的“坚韧”品质。很多年以后，他在接受《中国文化报》记者的约稿中披露了其间的细节：

人生旋律中热、冷两方面,确可以来回转换,关键是自己如何把握。……1969年至1973年我随文化部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最后一二年,人走得差不多了,由热转冷,劳动战地变成休闲场所。晚饭后我有时找萧乾、楼适夷诸先生聊天,后即转入屋内,点起来煤油灯看书。咸宁地处楚泽,广袤的平野常见大湖返照落日的奇彩。晚间我遥望窗外,月光下的远山平湖,仿佛看到这屈子行吟的故土总有一些先行者上下求索而悲苦憔悴的影子。这时心也就渐渐平静下来,埋首于眼前友人从远地寄来的旧书中。

当时,他的阅读和思考已经从两宋文学转移到了对宋诗与唐诗之异同问题上。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给予了他通贯数代史事的方法论启迪。因此《年表》记述道:“1973年4月,从咸宁‘五七’干校回京,参与中华书局启动的《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并担任《宋书》的责任编辑。……开始陆续撰写《唐代诗人丛考》。1978年底。……全书完成,并交付中华书局,全书共四十余万字”。这是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是处女作,也是成名作。

《唐代诗人丛考》在1980年1月出版后,钱钟书先生评以“精审密察”,“冠时独步”,并认为作者“精思劬学,能发千古之覆”,而引以为学问上的“畏友”(手迹影印件见两书卷首插页)。该书后来两次重印,至2002年累计印数为三万余册,次年被遴选入“中华学术精品丛书”行列。傅明善指出,从此唐代文学研究领域,“丛考”式的群体研究,“成为大陆学人颇为看中的一种研究方式”。

《唐代诗人丛考》是傅璇琮先生作为“浙东学派”当代传人的一个重要学术里程碑,开启了他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新征程。政协宁波市委员会主席徐季子教授在《浙东学派当代名家:傅璇琮学术评论》序言中指出:

傅璇琮同志是当代负有盛名的学者,学识精深博达,专治唐宋文学,但涉及的学术领域十分开阔,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他治学勤奋,著作多种,每一部专著或由他主编的大部专集出版,即受到学术界重视,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学者多认为“一心为学,静观自得”是他治学的精神支柱。

宁波学者公认傅璇琮同志是当代浙东文化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并发扬了浙东学派严谨笃实、经世致用的学风,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空间,为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家乡人为他感到骄傲。

他认为,“在(政治)运动不息的年月里”,正是其“一心为学”的初衷未受影响,坚持在“静观自得”中反求诸己,这才取

得了后来“高深的学术成就”。

“一心为学,静观自得”,原是傅先生在《李德裕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版)“新版题记”中的自述之语,也是他基于自己坎坷经历的一个可贵心得。同时为徐季子教授所激赏的另一句话是:“我们做学问,确不必有什么政治牵挂之虞和世态炎凉之辱。”

徐教授认为,脚踏实地,在“静观自得”中,“开创出一片光灿灿的学术天地”,说明了傅先生治学精神之“坚韧”。而“坚韧”正是“浙东学派”创始学者黄宗羲及其杰出继承者全祖望们所怀抱的精神内核。

## (二)

“浙东学派”的学术精髓,无论是治文还是著史,首先就是对“经世致用”的讲求。学术研究要作用于世道的改良和人心的向善,其旨趣是在于关注民瘼,关怀现实。但“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首先是通过学者本人文史兼治的手段来实现,并进而作用于现实社会的知识阶层的。傅璇琮先生的治学生涯,也鲜明地体现着这一学术特征。

由《傅璇琮学术评传》上编的“学术人生篇”可知,他是从新文学起步,而由清代古书整理入手,逐渐关注并将研究目光聚焦在初唐、盛唐诗人诗作上,再进一步推广到对中唐、晚唐文学领域的。……由文入史,文史兼治,是傅先生学术道路上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他作为“浙东学派”当代传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他在为戴伟华《唐代方镇文职僚佐考》所作的序言中说过:“治史对于治文,是能起去浮返本的作用的。”

在《唐代诗人丛考》问世以后,傅先生经过编辑130多万字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与张忱石、许逸民合编,中华书局1982年4月版)的积累,开始撰写他的第二部专著《李德裕年谱》(齐鲁书社1984年10月版)。

从1980年冬到1982年冬,他孜孜以求两年所获得的成果,继续招致同行专家的喝彩。南开大学中文系罗宗强教授指出:“在对纷繁复杂的史料的深见功力的清理中,始终贯穿着对历史的整体审视,而且是一种论辩是非的充满感情的审视”;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允吉教授则评价该书“是由精深的个案辨析进入博通研究的范例。……完全可以当作一部中晚唐的政治史和文化史阅读”。而作者自己则说:

李德裕主要是一个政治人物,但笔者在几年前立意为他写一部年谱的时候,却是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的。……牛李党争中,核心人物是李德裕。中、晚唐文学的复杂情况,需要从牛李党争的角度加以说明,而要研究牛李党争,最直接的办法则是研究李德裕。尽管环绕牛李党争,环绕李德

裕,历史记载,纷纭复杂,但是不从李德裕入手,无论对当时的政治或文学,都不能得到真切的回答……真正的学术研究,同艺术创作一样,是需要有探索 and 创新的勇气的。正因为如此,虽然我并不是搞历史的,又缺乏史学素养,但出于对那一时期文学和政治的探索的愿望,使我鼓起勇气来写这一年谱。

(《李德裕年谱》初版自序,1982年)

我感到,唐代中晚期,不少有代表性的文学家,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李绅、李商隐、杜牧、温庭筠、司空图等,都曾牵涉到当时的政治纷争。他们很关心国事,关心社会,也极重视自己的事业,但他们终究受到各种打击,自己个人、家属及友人都遭遇过祸害。从中晚唐的政事与文人的关系看,文人涉及政争,是没有不失败的。这很值得研究。这之中,有大的朝政问题,也有一些人的品质问题……不过还是杜甫说得对:“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一切都会过去,对有成就、有贡献的人来说,最主要还是看他本人的事业和作品。

(《李德裕年谱》修订新版题记之补记,2000年)

通过著书立说来发扬抑恶扬善的社会功用,显然是傅先生笔下所不曾缺失的东西。而这正是“浙东学派”在中国古典学术史上“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学统所系。

在经历了《李德裕年谱》的成功探索以后,傅先生开始撰写其第三部专著《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是一部文采与情感俱胜的文史随笔,可读性更强。在1984年底写的初版自序中,他自述把唐代的科举与唐代的文学结合在一起,是因为认识到社会在不断地发展着,社会生活呈现出一种纷繁多彩的面貌,因此“研究方式也应有所更新,要善于从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中把握住恰当的中介环节”,因此想要“尝试运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就是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或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做综合的考察,来研究唐代士子(也就是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整体研究的素材和前资……我决定本书采取描述的方式,而不是主要采取考证或论述的方式。我想尽可能地引用有关的材料,将这些材料按各专题加以介绍。

本书初版问世后,罗宗强先生在书评中指出,该书“纯粹

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文学的范例,它从一个侧面非常生动地展示了有唐一代士人的文化心态”。

又一个“范例”!在高手林立、强者如云的中国古典文学界,一个人的著作被论者冠以“范例”的美誉是不可多得的,可是傅先生在不到十年内却联捷登榜,“连中三元”!

“连中三元”,是需要以严谨学风为基础,学术创新为标竿的。难怪钱锺书致傅先生函中要说“严密缜栗,搜幽洞隐”,而启功函中也有“每开卷必有拍案叫绝处”的赞评。看来这一切,都建立在其博览群书、严谨治学的基础上。

1992年10月,傅璇琮先生在厦门被推举接替程千帆先生续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傅明善评介说,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唐代文学是众所公认的成绩最显著的一个研究领域,“而领导这一领域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的,则正是唐代文学学会的会长——傅璇琮。”对此一段心路历程,评传第五章《潜心学术,导夫先路开风气》中有颇为详尽的记述。

### (三)

对于文史兼治的“浙东学派”学者来说,以文证史,以史论文,都离不开对历史文化的把握和对历史地理的考察。作为该学派当代传人的傅璇琮先生来说,自然亦不例外。

《唐代科举与文学》于2003年5月印行第二版,傅先生在此前一年的元月所写的该书重印题记中回忆说:“我想把笔放开一些,做一部稍具文采、略带感情的轻松之作……通过科举来展示唐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与心理状态,进而探索唐代文学的历史文化风貌”,“1984年我所写的序言中,比较满意的是文后描叙从兰州至敦煌一段路程的见闻与感想,至今读来觉得仍有诗意……”。顷检傅先生2003年8月3日来函云:“寄上拙作两书,谨请指正。此二书均为旧著,初版一为1980年,一为1986年,此次均重印。因阁下是藏书名家,故寄上以证情谊。此二书前的重印说明,祈能拨冗一阅。《唐代科举与文学》重印题记后二页说及西北之行,颇有感慨。”

这是傅先生学术著作中难得的“诗意”笔墨,也是他多年来始终不能忘怀的游历印象:

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充分发达的时期。唐代文化是有着强烈的吸引力的。今年八九月间,笔者在兰州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而后再随会议的代表一起去敦煌参观。车过河西走廊,在晨曦中远望嘉峪关的雄姿,一种深沉博大的历史感使我陷于沉思之中,我似乎朦胧地感觉到,我们伟大民族的根应该就在这片土地上……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后人,我们在努力开辟新的前进道路的同时,尽可能重现我们祖先的灿



烂时代的生活图景,将不至于被认为是无意义的历史癖吧。

(《唐代科举与文学》初版自序,1984年)

2001年6月,我有幸再游河西走廊……到嘉峪关,我们就上城楼仔细一游,不像我上次在火车上依稀远望,这次总算了却一头心事。这次的河西走廊之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汉唐时期的中西交通要道,确与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有关。这条长达千余里的通道,南北两边各是雪山、荒漠,就是这条路上有绿地,特别是几座名城。另一印象较深的是,西北地区的现代化发展确实很快……80年代初我至敦煌,看到的多是农居小舍,颇有古朴之感,现在则是满街灯火辉煌,商店招牌炫目。最使我有感触的是在水天……

(《唐代科举与文学》重印题记,2002年)

“莽莽万重山,孤城石谷间。”(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天水古称“秦州”,是杜甫离开长安西行途中,曾经数月盘桓之地。那么,傅先生在这古秦州都见到了什么,又感慨了些什么呢?

他说,当下的天水城,“市内马路平坦,高楼林立,商业繁荣,有几处图书馆、博物馆也建得不错。但有一个遗憾,著名的渭水本是由秦州向东,流经长安的,而现在的渭水,却成为干枯的河道,河道中只不过零零散散有些小泥沼”,杜甫的秦州杂诗中有好几处咏及渭水,诗句中用的是“清渭”、“白水”以及“远水兼天净”之类的字眼,“一天清晨,我在渭水岸边,眺望北岸的秦岭,俯视满是石块的河道,吟诵杜甫的这些诗句,真不知身在何处。”

也是2001年6月的此次壮行途中,傅先生在西安提出,想去一探位于户县西部的溇陂湖。因为历史上的溇陂,湖面相当开阔,杜甫曾有“波涛万顷堆琉璃”句咏之。“但没有想到,我们那天去看,溇陂湖却是一片干枯”,心里的郁闷可知。随后想看看的位于周至县的仙游寺,应是唐诗史上的名胜。当年白居易在此吟出了“犹爱云泉爱在山”的名句,据说《长恨歌》也成诗于此,可是现实中的仙游寺,却已杳然无存,据云因建水库,已将仙游寺沉于库底,当地拟在附近新建,云云,那么此行的失望就更不在话下了。

“人无百年寿,常怀千岁忧”,借助史地的兴废感慨,来表达对现实民生的关怀、对未来社会的忧患,是中国古典学者所独有的一种人文胸襟,也是“浙东学派”的基本学术精神之一,“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诗句)这一点在傅先生前后两序中亦体现无遗。

已读万卷汉唐书,须行万里尘土路。难以忘怀,屡屡道及

……这一情结正反映出当日面对真场实景,傅先生感慨颇深,思虑甚远。诚然,对于这位从小生长在浙东海隅、学成于京城燕蓟的学人来说,这种“无字书”的阅读,所获得的现实与史实的反差,对于其心灵所发生的震撼是不容低估的。

其实历山涉水、观世证史,尤其是对于唐人履及诗及之地的流连……这一浓厚的历史地理情结,至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已开始在其心中凝结。试看1982年底他在《秦德裕年谱》初版自序中写下的最后一段文字:

“笔者今年五月间在西安参加全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大会,饱揽了西安的山川胜迹,大雁塔,小雁塔,昭陵,乾陵,华清池,杜公祠,兴教寺,青龙寺,在在引起人们对悠远历史的遐想,使人留下美好的回忆。谨以本书献给永远值得人们怀念的历史文化名都——西安。

#### (四)

学术为济时之舟楫,文治之鞍马,但“经世致用”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和虚妄的目标,它是要通过徵文考史、造句建章的学术手段来表达,尤其是为人为学的美誉度来传播的。那么,被称为“浙东学派当代名家”的傅璇琮先生是如何称美文坛、载誉学林的呢?

凡三十余万字的《浙东学派当代名家·傅璇琮学术评论》,收录的是有关学者为傅氏著作所写的序言和书评,及其嘉言懿行的记述和学术建树的评论。该书在多视角、多层次、多方位上,提供了一个来自同行专家的认识傅氏学品和人品的更为丰满生动的文本。

徐季子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指出,傅氏在治学上,“探讨问题求真务实,弄清事例的本末真伪,坚持实证,解决一个问题要翻阅很多资料,从别人未发现的问题中找出真实可信的依据来修正前人的错误”。他说:

我每读璇琮的书常常会有如在读浙东学派前贤著作的感觉……他们有严谨治学重考证、情理兼容重实学、经世致用重实践、言行一致重德性的共性。“浙东学派”前辈学术重心在哲学、史学、伦理学方面,璇琮同志学术重心在古典文学方面,他们的研究范畴不同,但严谨笃实的学风、纯正明达的文风却十分接近。浙东学术文脉源远流长,璇琮的学术是这条文脉中的一环。我们相信浙东学脉今后还会绵绵不断地延续下去……

台湾大学罗联添教授也在序言中说,自从1990年11月,在南京举办的“唐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上与傅氏订交以来,“发现其研究方法、范围等,竟与个人有许多相同或类似,如皆注重

学术研究基础,进而从事理论性考辨……其所以如此,推考后,方知彼此系出同源:个人就读台大中文系,业师皆出身北大、清华,而傅先生乃自清华转北大毕业,治学方面自不谋而合。他指出:

傅先生儒雅温厚,与人无忤,治学勤奋,专心致志,贡献学术,具有老北大前辈学者风范,极受两岸学者敬重,在台湾尤受礼敬……傅先生撰著八种,编纂研究资料二十四种……大致可看出其治学精神、方法与趋向,归纳有下列三大特色:(1)从个案研究通向整体研究;(2)研究从点、线到面,展现唐代文学发展过程;(3)先构筑研究基础再进入考辨性理论,基础、理论齐头并进……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内地学者对傅璇琮先生之著作即多有评论,本书所选辑之书评就有二十多篇,使我深为欣慰的是,浙江宁波的文化、出版界,对本籍学者傅先生学术业绩如此关注,特编纂一部学术探讨文集,既有已刊发之书评,又有记述傅先生广泛学术交往之新撰论作,读来倍感亲切。

天道酬勤,勤者必劳,劳者始能,能者终获……至此我们已不难发现,经过二三十年来锁定目标后的学术耕耘,同样“潜心于书斋,超然于兢途”(傅璇琮序《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中评价曹道衡先生语)的傅先生,不仅奠定了其在唐代文学领域中知名海内外的学术地位,而且还建构了他在当代“浙东学派”链条上承先启后的文化影响力。

按:比黄宗羲(1610-1695年)“浙东学派”之说更早的概念,是南宋大儒朱熹(1130-1200年)提出的“浙学”。以黄梨洲私淑弟子自任的全祖望,曾对“浙学”概念作了比较明确的界定和阐说。在他的观念里,“浙学”主要是指“浙东之学”,但也包括“浙西之学”。清代中后叶,有浙东学者章学诚作文《浙东学术》弘扬于前,近代新学大师梁启超好评于后,再加上现代史学家何炳松、陈训慈等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先后撰著发表《浙东学派溯源》、《清代浙东之史学》,于是“浙东之学”俨然成派,从此在中国文化史殿堂中占据了重要一席。

2005年5月10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吴光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浙学”的内涵及其当代定位》一文。他指出,广义的“浙学”的内涵即“大浙学”概念,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于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这个“大浙学”,是狭义“浙学”与中义“浙学”概念的外延,既包括浙东之学,也包括浙西之学,既包括浙江的儒学与经学传统,也包括浙江的佛学、道学、文学、史学、方志学等学术传统。其主流学统,“仍然是南宋以来的浙东经史之学”(包括东汉会稽王充的“实事疾妄”之学、两宋金华之学、

永嘉之学、永康之学、四明之学以及明代王阳明心学、刘蕺山慎独之学和清代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为代表的浙东经史之学)。他认为:

从总结浙江学术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而言,自然应当对狭义、中义与广义的“浙学”分别加以系统的研究与整理,但站在当今浙江文化建设的立场上,我们则应取广义的“浙学”概念,对两浙之学作系统的全方位的研究,而不应仅仅局限于“浙东学派”或“浙东学术”的视野。在“浙学”的发展过程中,思想先驱们逐渐积累和提炼出其学术精神——浙学精神。这个“浙学精神”可以概括为“求实、批判、兼容、创新”八个字,而王充的“实事疾妄”、叶适的“崇义养利”、黄宗羲的“经世应务”、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正是浙学精神的典型体现。

2006年5月,在宁波召开的“浙东学派与中国实学文化”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也达成基本共识,认为“浙东学派的思想渊源可以上溯到南宋的永嘉和永康学派”,倡导以“崇实黜虚”、“实事求是”、“经世致用”为主要内容的“实学”,是浙东学派的核心观念之一,抓住了“实学”,也就抓住了浙东学派的本质。浙东学术的实学观,对浙江乃至整个中国知识人群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产生了积极有益的影响。

较早注意到傅璇琮先生学术世界中的“实学”倾向的,是现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刘石先生。他在1996年就撰文发表在《文学评论》第6期上,他以《唐诗论学丛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为依据,兼及《唐代诗人丛考》等著述,指出傅先生“将实学视作学术研究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一种方法”,“他很早就将这种方法用于自己的学术实践”,而且他在意识中希望能够用它来起到反拨一时学风的作用”。他认为:

一个时代的学术要形成一种“思潮”,必得这个时代的学术界有一些这样的学者,他们用自己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果昭示世人,并由于这些思想和成果符合学术发展史的需要而获得相当程度的响应。从某种意义上讲,傅璇琮先生讲求“实学”的学术思想和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成就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的。

我们相信,傅璇琮先生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所形成的治学特色,由这种治学特色而体现的学术思想,与他所拳拳服膺的老一代学者的影响是不可分开的。我们更相信,年轻一辈的学者已经也必将继续从包括傅璇琮先生这一代学者在内的前辈身上接受有益的影响。薪尽火传,在这里,我们十分清晰地看见祖国源远流长的学术

文化怎样在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手中传递、承继,向前发展……<sup>[1]</sup>

人生有时尽,学术无止境。需要特别揭示的是,随着年事日高和地位日崇,傅璇琮先生晚年的治学,更多地表现出自我检讨和反省提高的特点。

就自我检讨而言,傅明善教授在其评传下编第一章《热中求冷:学术理性开新境》中已经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即“学术成果的自我反思”是其“学术理性的人格表现”之一。他举例指出,傅先生在《李德裕年谱 新版题记》和《唐代科举与文学 重印题记》中,“用相当的篇幅不厌其烦地一一说明”了原书中存在的失误,以及可予订补的文献资料。他据此评论说:“其目的就是在努力打破学术壁垒,倡导一种实事求是的‘实学’精神和学术平等的良好氛围,其用心之良苦昭然可鉴”,而这种“学术自讼”式的做法,在傅先生似已为“一种自觉的行为。”

如近刊于2007年第5期《中国图书评论》上的《谈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傅先生就列举了学术界对其《唐翰林学士传论》(沈阳辽海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盛中唐卷”所提出的各种探讨意见,表态说让自己“深受启发、教益”。他引用宋人叶梦得“古之君子不难于攻人之失,而难于正己之是非”一语,认为:“学术研究是不断探索的进程,有所得,也会有所失,这就要在自我摸索并广泛吸收意见中踏实行进。”

这一重要的学术研究和著述特征,说明傅先生往往通过搜集著述流传以后的同行批评,加强自我检讨和问题研讨,并通过校正修订,以求文本日臻完善、见识不断升华。

因此,我们读傅先生的著作,不仅要读他的初版,而且还要读他的重印本或者修订版,关注他于旧著做了怎样的校订补缀,尤其要注意研读他新写的“重印题记”、“新版题记”一类文字。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追踪著作者在学术上的新创获新见识。

作为“浙东学派”当代传人的傅璇琮先生,其学问心得自多耐人借鉴之处。傅明善教授在梳理了传主的人生轨迹和学术来路后,曾在评传的下编第二章《意气骏爽,篇体光华显情采》中发表见解道:“初涉社会的苦难加强了他人生选择的执著,被排挤出学术主流反而强化了他的理性思考。”他还评说道:“在别人正热衷于投身到各种运动之中的时候,他却在那冷静的一隅细细地阅读着晚清文人的文集和日记杂著,居然真的就像是‘忘却营营’了一般”。

我以为,使得当日的人生苦难转化成为其后来的人生财富的关键,首要的还是傅先生当年那始终未曾坠落过的好学之志。因此,作为后学晚辈,我和傅先生一样,总是忘怀不了他被贬斥至商务印书馆(时位于北京东城北总布胡同10号一个四合院)以后,悦读《越缦堂日记》的那个珍贵的长镜头:

我所在的古籍编辑室,正好是在北屋西头,面对的是一个颇为典雅幽静的小院子……我是住集体宿舍的,住所就在办公室后面一排较矮的平房,起居十分方便。一下班,许多有家的人都走了,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花,就着斜阳余晖,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一面浏览其在京中的行踪,一面细阅其所读的包括经、史、子、集的各类杂书,并在有关处夹入纸条,预备第二天上班时抄录。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差一点忘记了自己的“罪人”身份。<sup>[2]</sup>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正是这种坚韧沉毅的内在性格和好学求知的文化定力,成就了傅璇琮先生这位“浙东学派”的当代传人。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陶渊明《读山海经》),曾经给予苦难困厄中的傅先生以沉浸学问的方向指引,因此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人的一生,有苦有乐,有顺利,有曲折,但我觉得,不论居何处境,不要忘记读书,总要记住陶渊明‘时还读我书’,心情就能舒旷、怡乐。”他还在读了王世襄所著《北京鸽哨》、傅熹年所编《藏园群书题记》、陈抗《荀周古文字读本》和《尊审言文集》等书以后说:“读冷僻书,犹如吃青皮橄榄,或喝毛尖绿茶,初似生涩,终有一种回味……冷能避俗。”他读了中华书局版《帛书老子校注》和《出三藏记集》这两部“冷僻书”后,强调说:“我一向认为,如果想真正读点书,如果想真正搞点学问,最好不要去追求什么热,这种热,看似热气腾腾,一会儿就灰飞烟灭……”

“总要记住陶渊明‘时还读我书’这一佳句”,“如果想真正读点书,如果想真正搞点学问,最好不要去追求什么热”,“读冷僻书……能避俗”,“我们做学问,确不必有什么政治牵挂之虞和世态炎凉之辱”,“真正的学术研究,同艺术创作一样,是需要有探索和创新的勇气的”,“一心为学,静观自得”……

这看似随口道来、信手写出的心得,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原来它们都是“浙东学派当代名家”傅璇琮先生取得学术成就的告人之秘,也是他度给每一个立志治学者的不二金针。也因此,《傅璇琮学术评传》和《傅璇琮学术评论》的问世,为我们具像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学界仪型,我们正可由此得到一种步入中国古典学术殿堂的可能路径。

“当年我还在宁波念初中时,城隍庙和天一阁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地方。”去年12月26日上午,傅璇琮先生在天一阁博物馆为他举行的书籍、手稿捐赠仪式上致辞说。随后他将其自著、主编和收藏的名家签名本77种、凡260册以及一批有关手



稿捐赠出来,使之成为了‘天一阁中国特色文献收藏中心’的首批珍藏品。如今两书卷首的书影、手迹、照片,就有不少取材于这一特藏。

“一切都会过去,对有成就、有贡献的人来说,最主要还是看他本人的事业和作品”,“学术书,不必看奖牌,而应看在一定学科领域内是否被人引用,以及所占的学术位置。这才是

真正学术著作的品位,也是它不可代替的骄傲。”(傅璇琮语)

一个学者,他的著述能够获得家乡博物馆的珍视并专藏,并被历来奉‘浙东学派’若神明的父老乡亲视为该学派的当代传承……这该是一个真正读书人最引以为无上荣耀和无比骄傲的衣锦还乡了。原来,“本人的事业和作品”也能说话,而且说的是留给后世来者的碑传性质的话。

·拂云楼·

## 群体合作:中国阅读文化研究之路

林 英

阅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人类文字符号出现就已经开始客观存在。对阅读的认识和研究,也有着漫长的历史。针对如何阅读、阐释前贤经典,出现了注疏经典的经学,从学术上看,经学的出现就是阅读学的开始。也就是说,中国的这种释义阅读学始于先秦,成熟于汉代经学。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现代阐释学、接受美学被译介到中国,现代阅读学发展得很快。但这些研究中,始终很少有把阅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将其置于社会历史的整体环境中综合考察,从宏观上揭示阅读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王余光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撰写《中国文献史》时,便对阅读文化产生兴趣,从此开始致力于阅读文化领域的探索与研究。最初开始着手的是对阅读文化方面的资料 and 知识进行系统化整理,其中有众多专家历时四年编纂、中国书史上第一部以读书为主题的百科全书《中国读书大辞典》(王余光、徐雁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部180万字的读书专科辞典的编纂出版,标志着中国的阅读研究进入社会学与文化学领域。

王余光先生对于阅读文化的研究,摆脱了学术研究中常见的单枪匹马形式,他带领门下研究生一起参与深入。2000年,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部分师生还对阅读史和阅读文化举行了专门的讨论会,对中国阅读史框架的建构作出了初步的设想。在其主持下,一批有关阅读文化、阅读史等专题的文章相继在《图书情报知识》等杂志上刊发。

《中国阅读文化史论》(王余光等著,许欢、李雅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9月版)学术论文集便是他们这几年研究成

果的结集。全书共26.5万字,分为‘阅读文化研究’、‘阅读史研究’、‘书的选择与阅读’、‘阅读网络研究’四编,多位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考察了阅读这种文化现象及其历史,反映了当前国内外阅读研究的热点与最新成果。

该论文集内容涵盖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网络、理论与方法等方面的研究。

宏观上,开篇《关于阅读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即对阅读文化的概念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并概括出阅读文化的特征,从整体上把握其研究的意义。‘阅读史研究’一编中,有《西方阅读史研究述评与中国阅读史研究的新进展》,概述西方阅读史研究的范围、论题、主要方法和研究成果;《中国阅读史论》梳理出中国阅读史方面存在的资料,析出阅读的多重含义,并论述阅读的传统与变迁。

微观上的研究,单就‘阅读文化研究’一编而言,就涉及有家庭阅读的重建、图书馆与大众阅读的关系、出版与大众阅读的关系、数字时代读者需求对出版业的影响、读者群体意识对阅读的影响等,从多个侧面探讨阅读文化。

中国是一个阅读历史悠久的国家,关于阅读的史料自然颇为丰富,如历代学人论读书、论读书方法,他们读书的掌故等等。该书的第二编九篇文章就是关于阅读史的研究。这些关于阅读史的研究,有从阅读层面的某个角度进行通史研究的,如《中国文人的生活时尚与阅读》,即论述了中国文人读书的历史状况与现实的变迁;也有具体历史时期的阅读研究,如《1948-1998年读书热点解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生阅读研究》,而后者实际上也可说是现代的阅读研究。